

七日談
(香港篇)

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時期，鄉土文學的出現，即伴隨作家與所書寫「鄉土」之間呈現出的地方認同議題——作家是否「在地」於「鄉土」。參考魯迅對鄉土文學作家群的定義，他們往往居於城市，為故鄉所放逐，描寫家鄉各自不為旁人所熟悉的地方特色，故不免有異域情調：「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着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由此可見，對這批作家而言，鄉土／故鄉成為了某種與「地方依戀」相關的「他性空間」——相隔愈遠，鄉情愈熾。

一九三〇年代以降，在香港所出現的南來作家群體——自蕭紅、徐訐至李輝英等，其作品對「鄉土」的執著，構成了另一種「僑寓文學」的代表。如李輝英所言：「『鄉土氣』在我的文學寫作中既然像是成為一個定型（假如真可以這麼說的話），那麼你想改換了它而去迎合當地的洋場氣看來不過東施效顰或削足適履罷了，畫虎不成，肯定是難以討好的。」值得思考的是，這段話將「鄉土氣」與「洋場氣」相對，似乎屏蔽了香港這方水土自身所包含的「鄉土」元素。

職是之故，我們需追索由鄉土文學所引發的「鄉」與「城」的對應性關聯。以「僑寓文學」的性質而言，去「鄉」顯然更凸顯其離散指向。《列子·天瑞》所謂「有人去鄉土，離六親」，是對地緣與血緣的雙

重背離。而書寫鄉土，可視為對心理根脈的回歸與重認。在這一定義下的「鄉土」，亦不僅指在地理區劃認知上與城市相對的鄉村空間。審視鄉土文學重要的代表作《果園城記》，如作者師陀言：「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而其取材「不見得同是小城的出產：它們有鄉下來的，也有都市來的，要之在乎它們是否跟一個小城的性格適合」。我們可如此理解，相對於沈從文《邊城》中的湘西鳳凰，果園城更近似於雜糅了鄉土與城市元素的複合性空間。沈氏在長篇小說《長河》中，亦有意將辰河流域的碼頭小鎮「呂家坪」作類似的建設，但因其作未竟而中斷，卻以「常與變」點出了這雜糅元素的分野——現代文明與傳統生存語境之間的搏弈。

若以此為觀察來審視香港當代的鄉土文學，會發現其發展從文學主體性的角度，天然帶入某程度的甄別意義。首先相較早期的鄉土文學——如在左翼文學路線影響下所創作的《窮巷》《蝦球傳》等，其在情節設置上不再採用階級對立意識為先導，而代之以普遍性的世態人情；其二，從香港整體文學品格而言，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實現了在雜交性（Hybrid）城市文化形態中，與「都市氣」有效的質壁分離。而其依託的，恰是對「鄉土」的進一步定義。「香港……有一個逐漸繁華的過程……它的繁華只在維多利亞港口和中環、灣仔等幾大鬧市，港島的窮街陋巷、市井小民佔壓倒多數，這正是鄉土文學滋生的大好土壤……

在地鄉土

葛亮

鄉土性本身就包含着「市井性」。以被譽為香港鄉土文學經典的《太陽下山了》為例，其「市井性」既體現於本土性的地理人文景致，亦具有空間的邊緣性指向。「從香港中環——繁盛的市區——乘電車到筲箕灣去，自成一區的西灣河是必經之地。」這段文字包含清晰的由主流都市空間逐步淡出的意味。其中，「自成一區」是個十分值得思考的界定，其以空間的獨立性，模擬了在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等層面與「都市」間的區隔。這亦成為在舒卷城的「西灣河」書寫之後，香港作家構築鄉土意象的基本依據。

以上種種，因作者「地方依戀」的投入凝為文字，被讀者廣泛地閱讀，從而成為集體回憶的載體，進而深化為地景。但無可否認的是，隨着經濟發展提速與城市工商業的日益發達，這些地景在現實層面逐步式微至於消逝。陳智德曾在《地文志：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一作通過作者對九龍城、維園、北角、旺角、調景嶺等地景「抒情考古」的書寫，重塑香港空間與時間的辯證。而「民俗」則因其強烈的地方認同的意味，在鄉土書寫中被一再強調。不同於「五四」時期以降文學作品所反映鄉土空間的「封閉」格局，香港的「民俗」非受到工業文明漸進式的侵襲。其與現代文明猛烈衝擊之間的抗衡，成為香港鄉土小說的另一重要母題。追溯至一九六〇年代末，彼時崛起的鄉土作家海辛的作品中，就這一點表現得相當突出。以海辛的幾部代表性作品為例，都市皆以傾覆的姿態對應於鄉

土。而其中民俗元素，如粵語殘片、老式照相館、旺興街渡、竹林古村，皆被一一覆沒，如消逝於歷史深河。

顯而易見，隨着社會發展及城市格局的興變，從某種意義上「鄉土」在香港作家筆下已趨向廣義，並傾向以居住空間作為喻體。迄今，房價高企位居世界首列的香港，其房屋政策導致人群以空間佔有作為尺度出現分化。政府為安置低收入人士的公共房屋（居者無業權）與私人樓（居者持有業權）之間形成了社會階層的區隔，也由此建構了截然不同的生存語境及人際關聯。相對於後者呈現出的現代都市化「法理社會」取向，前者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禮俗社會」特徵。費孝通引用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的觀點，稱其社區運行模式為「有機團結」，其有機性體現於「先我而存在的生活環境」，即居民並非「選擇得來」，而是「生而俱與」的人際關係。類似情形也發生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組屋社群，如黎紫書小說《流俗地》中的「樓上樓」所建構的市井民生，即屬

於此。在香港，公共屋邨承載了這個城市大部分人的集體回憶，甚至其本身的發展過程，亦成為了香港禮俗社會變遷的縮影。在香港作家的筆下，由公屋所帶來的「地方依戀」，建構了十分完整的社會性地景譜系：如木屋區（唐睿《footnotes》）、徙置區（林超榮《薔薇謝後的八十年代》）、Y形屋邨（潘國靈《合法偷窺》、華富邨（王良和《華富邨的日子》）。相對於私人樓宇處於自由市場的頻繁流動，屋邨則因其屬性處於相對靜定的低流動性，也造就了其內部相對充沛的人際交往。這其中包含了長期形成的血緣與地緣的沉積，從而帶來了「熟人社會」的「雞犬相聞」的鄉土意義指向。

因黑澤明影片《沒有季節的小墟》的觸發，海辛寫作《香港無名巷》一書。「就在這林立的現代化大廈的背後，有着另一個世界。那是一條連名稱都不曾有過的無名小巷。」無名巷的消逝，代表着香港社會結構在幾經嬗變的都市化進程中徹底的轉型。亦可理解為，其構成了沒有所指的鄉土地景——對市井民俗與其涵蓋的價值觀的載體，成為生活在這城市的芸芸眾生，地方依戀的最終憑藉。



民眾到大澳乘坐搖櫓船欣賞花燈。

外交部駐港公署組織140師生觀賞

舞劇《龜茲》再現千年絲路藝術瑰寶



舞劇《龜茲》將靜態壁畫與出土古物轉化為靈動舞姿。主辦方供圖

舞劇《龜茲》演出活動現場。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萬霜靈攝

絲綢之路橫跨千年，連結東西方商貿往來，也推動宗教、藝術與民俗交流。以古代絲綢之路北道重鎮龜茲為題材的舞劇《龜茲》，昨日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上演，透過舞蹈與音樂呈現新疆一帶的歷史文化面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亦組織香港大學生外交夏令營營員及「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優勝師生約140人到場觀賞。有學生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可在「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層面發揮橋樑作用，令海外人士加深對沿線城市歷史文化的認識。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李千尋

龜茲是古代西域著名的綠洲國家與絲綢之路北道重鎮，位於今天的新疆庫車市一帶。舞劇以龜茲歷史文化為主線，串連鳩摩羅什傳佛學、玄奘西行取經等題材，藉跨越時空的敘事鋪陳龜茲文化的演變。演出以舞台視覺與多媒體效果構建石窟、風沙與商旅往來的意象，配合具地域特色的節奏與旋律，舞者以群舞、獨舞及對舞等段落，呈現龜茲樂舞的動感與層次，服飾、動作設計亦融入壁畫造型與古代禮俗元素。

取材蘇巴什大寺出土彩繪

作品多個舞段的創作靈感均源自珍貴文物與藝術瑰寶，將千年石窟的靜態壁畫與出土古物，巧妙轉化為舞台上靈動的舞姿，盡顯絲綢之路的文化底蘊。其中舞段「蘇幕遮」的創作靈感，來自蘇巴什大寺出土舍利盒彩繪，還原了原畫中21人組成的樂舞隊伍，涵蓋舞者、奏樂者與執杖者，甚至在一旁協舞的孩童，服飾各異，重現了古代龜茲地區歌舞祈福風貌。「般

若世界」則參考克孜爾石窟第38窟天宮伎樂圖，以多組伎樂對列的舞台調度，呈現吹奏、彈撥等樂舞意象，突出龜茲樂舞的地域風格。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的嚴同學認為，是次舞劇在音樂與服飾上有不少新疆元素，讓他有機會接觸多元文化。他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可多透過藝術表演、展覽等方式向外界介紹「一帶一路」相關文化，例如今次由新疆舞團來港演出，正好讓本地市民、特別是對少數民族文化較陌生的觀眾，加深認識與理解。

廖寶珊紀念書院的徐同學表示，自己在學習中國歷史時認識張騫等人物，並了解兩漢時期絲綢之路的發展脈絡，今次舞劇則進一步拓寬他對於絲綢之路的了解。他表示，香港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可在東西文化交流方面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於推廣中華文化方面發揮所長，包括介紹絲綢之路沿線如新疆、甘肅等地的歷史與文化，讓更多海外人士透過文化交流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談及早前參與的第十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徐同學認為，賽事有助香港青年了解國家發展與歷史文化，增強身份認同與自信，同時亦要求參賽者掌握各國關係與國際議題，從蒐集資料與答題過程中拓闊視野、深化思考。他對相關領域興趣濃厚，亦喜愛戲劇、詩詞及古典文學等中國文化內容，現時就讀中六的他亦立志在大學修讀中醫，進一步傳播中華文化。

目之一。

文化交融流變的宏大畫卷，讓龜茲文明煥發新的光彩。本劇是「國風國韻飄香江」演出季節

話你知

翻譯家高僧摩羅什

古代打高僧摩羅什

心造三年《龜茲歷》

茲打高僧摩羅什



多倫多電影節閉幕「電影市場」未能拉高入座率



多倫多電影節2026(下)

第五十一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已於日前閉幕。總結本屆成績，影展因增設了「多倫多電影市場」而令氣氛熱鬧得多，各地遠道而來的參展商與電影人數量提升，影展街也擠得水洩不通，但電影放映的入場人數卻跟以往相若，未有大幅提高。除了剛在威尼斯奪獎的影片或來屆奧斯卡的熱門電影外，其他影片的入座率只屬平穩，反映「電影市場」對入座率的正面影響不大。

金獅獎得獎作品北美首映

每年的多倫多電影節，均會有多部威尼斯影展得獎作舉行北美首映，包括上回談過的《野馬九號》(Wild Horse Nine)。而勇奪金獅獎最佳電影兼最佳女主角的電影《女人，未知》(Woman Unknown)，由丹麥女導演梅爾·圖琪(May el-Toukh)執導，講述二戰後一位即將嫁給其僱主的丹麥女傭再遇年輕時曾相戀的德國軍人，為保婚姻，她極力掩飾自己的過去，卻惹來一連串的悲劇。本片作為本屆威尼斯唯一由女性單獨執導的入圍影片，獲得女主角獎已很不錯，但影片同時膺金獅獎卻有點過譽。

獲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的作品，韓國導演李滄東的《假如愛有如果》亦於多倫多影展放映。影片講述一位下崗工人及其妻子為富裕的女導演拍攝有關工人權益的紀錄片，兩對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夫婦，因拍片而逐漸建立友誼。本片的創作靈感來自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十誡：第十誡》(The Decalogue: Ten)。筆者較喜愛該作品，皆因李滄東冷靜地將人文關懷滲透全片，比《女人，未知》的類型片格局來得深刻透徹，且更為動人。

參展AI電影差強人意

作為奧斯卡前哨戰，《我造洛奇》(I Play Rocky)原是獲獎大熱之選。本片由彼得·法拉利(Peter Farrelly)執導，以人物傳記重構五十年前史泰龍(Sylvester Stallone)打造出《洛奇》(Rocky)的故事。可是除了男主角扮相相似外，影片故事卻未及原作的夫子自道來得直接有力。

另一部則是謝西·艾辛堡(Jesse Eisenberg)執導的新作《The Debut》，影片講述一名怕醜婦女意外被社區音樂劇導演相中，卻在揣摩角色期間漸漸失控。艾辛堡除了擔任導演外，還親自為片中多首音樂作曲填詞。而女主角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更在片中盡情發揮其喜劇細胞，相信有機會再次獲得最佳女主角。

其實多倫多電影節亦設有不同獎項，包括鼓勵導演的「平台環節」以及最受注目的「觀眾票選大獎」等，此獎項由西班牙電影《黑球》(La bola negra)奪得，觀乎影片的受歡迎程度，亦非意料之外。諷刺的是，英語電影《Elsinore》卻獲得了觀眾票選的國際影片大獎。看來大會對國際影片的定義仍然甚為模糊。

值得一提的是，本屆有數部應用AI技術協助拍攝的影片，其中包括英國導演丹尼·波爾(Danny Boyle)的新作《Ink》，及諷刺美國商人的紀錄片《馬斯克》(Musk)等，但兩片的AI技術均差強人意，此等技術亦在多倫多遭到觀眾及影評人大肆批評，看來用AI製作電影，現在還未是時候。



本文作者為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

韓國導演李滄東作品《假如愛有如果》劇照。